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真是种植水稻促成中国人崇尚整体思维吗？

作者：汪凤炎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选题具有新意，是对《科学》杂志一篇文章的反驳，是对“水稻理论”的一种挑战，研究者采用先破后立的方式，掌握资料全面，前瞻，尤其在对“水稻理论”进行反驳时比较有理有力，列举事实充分。文章观点鲜明，材料丰富，论证逻辑严谨，思路清晰，文字通畅，对“水稻理论”的驳斥很有道理，引人深思，是一篇有独到见解，有理论深度的文章。

意见 1：对整体思维的含义做出解释。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建议！这次修改呈现了两种对整体思维的定义，其一是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和成中英等人撰写的大作中的观点，其二是著名心理学家 Nisbett 等人所作的界定。这样，整体思维的含义是：

整体思维，也叫整体观或有机循环论的整体思维，认为世界（天地）是一个自组织的有机整体，整体包含许多部分，各个部分自身也是一个个小的整体，各部分之间有密切联系，因而构成一个整体，想了解各部分，必须先了解整体（张岱年，成中英等，1991，p.8, p.20）。Nisbett 等人对整体思维下了一个更心理学化的定义：一种将背景（the context）或场域（field）视作一个整体（as a whole）的倾向，包括将注意力放在关注客体与场域之间的关系，以及偏爱以这种关系为基础来解释和预测可能发生的事情（Nisbett, Peng, Choi, & Norenzayan, 2001）。

意见 2：仅仅将大禹治水这样一件事作为中国人整体思维形成的外因依据不够充分，应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及作用考虑在内。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指出的问题。正如评审专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人偏向整体思维有复杂的外因，包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等都在其中有一定的影响。这次修改，增添了 Nisbett 和张岱年等人解释影响整体思维产生的因素的观点，内容如下：

从外因上看，中国人偏向整体思维是多种外因长期共同交互作用的结果。例如，中国的社会生态主要由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较肥沃平原、丘陵与能通航的河流构成，所以，中央集权统治较易施行；农耕方式要求人们相互协作，而灌溉系统又要求中央集中管理，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睦便显得重要；中国人在经济、社会行为和政治生活中必须照顾到周围的同辈和上司，这种社会实践有利于中国人养成整体思维的习惯；中国的世俗哲学强调自我与他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Nisbett, 2003, pp.32-39；尼斯贝特，2010，pp.29-33）；汉语是整体定位法，文无标点，也不分段，意义在网络中被决定，整体决定部分，对整体了解越多，对个体也就了解越多（张岱年，成中英等，1991，p.197）；重视关系（包括人际关系）超过重视实体、强调整体尤其是关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偏向综合而疏于分析的文化基因（张岱年，成中英等，1991，pp.212-213）。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培养中国人的整体思维。

审稿人 2 意见:

文章旨在驳斥“水稻理论”对中国人偏好整体思维的解释,并提出中国崇尚整体思维的新解释。全文表述较为清晰,层次分明,引用大量的考古学、历史学、古典文学文献记载来作为支持。作者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以及敢于挑战权威期刊研究成果的胆量值得肯定。不过,文章还存在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意见 1: 立论及综述方面。(1) 首先,文章虽然准确把握了“水稻理论”的主旨,但对该理论的适用性存在误解。Talhelm 等人(201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耕种类型可以解释中国南北方文化差异,并以此为据提出了“水稻理论”,用以解释中国(或东亚国家)内部的亚文化差异。虽然 Talhelm 等人(2014)在讨论结尾指出,该理论或许也能够解释东西方文化差异,但这只是他们的猜测,还未在研究中得到检验。然而,本文却直接把 Talhelm 等人的“猜测”当作了他们的“结论”进行驳斥,这并不妥当。建议作者在立论上,更加客观、严谨、准确一些。(2) 其次,文章主体是解释中国人(东方文化)偏爱整体思维的内外原因。但文章缺少对前人研究的综述,如 Richard E. Nisbett 的文化心理学研究。除了引用作为驳斥对象的“水稻理论”之外,基本上没有引用心理学方面的相关研究。即便是“水稻理论”,也未能引用相关重要文献,比如朱滢(2014, 2015)的《检验“水稻理论”》和《再谈“检验水稻理论”》这两篇文章,以致对水稻理论的适用范围存在误解。因此,文章的综述部分需要加强。又比如在 1.2 部分,作者认为“水稻理论”中,南方人比北方人更擅长整体思维的结论是不成立的,认为是没有依据的。然而,还是有研究表明,与北方人相比,南方人的确更强调整体思维和集体主义文化(马欣然,任孝鹏,徐江,2016)。

回应: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建议!评审专家所指出的问题已在正文中一一作了相应修改,具体地讲:

第一,修改稿增添了前人研究的综述,如已引用了朱滢老师两篇大作的核心观点。同时,又重新仔细阅读了“水稻理论”的原文,使立论更加客观、严谨、准确。修改后的内容如下:

Talhelm 等人挑战以往跨文化心理学和文化神经科学主要基于畜牧业与农业生态差异基础上解释东西方思维差异的观点,提出了用以解释东西方人心理差异的新假说——“水稻理论”(The Rice Theory),它的核心观点是:耕作类型可能会引起文化差异,种植水稻与种植小麦的差别才是东西方人心理差别的主要生态基础。种植水稻与种植小麦有重大差别:稻田需要大量用水,不仅灌溉时要与邻居协调用水时间与用水量等,而且修建、维护灌溉系统不是一个家庭能够完成的,同时,种植水稻劳动量大,让人们相互依赖与合作,结果,水稻文化塑造了人的相互依赖性,长期的水稻种植史导致生活在水稻区的人们更倾向于整体思维和集体主义;小麦易于栽培,不需人工灌溉(仅靠降水即可),播种和收割小麦的劳动量仅为水稻的一半,所需劳动量小,不需与人合作也可独立完成,这样,种植小麦让人们彼此独立,结果,小麦文化塑造了人的独立性,长期的小麦种植史导致生活在小麦区的人们更倾向于分析思维和个体主义。Talhelm 等人认为,“水稻理论”是应用于水稻种植区的文化,而不仅仅是应用于种水稻的人,所以,只要你生活在因漫长的水稻种植史所形成的水稻文化地域,或者,生活在因漫长的小麦种植史所形成的小麦文化地域,即便你从未亲自种过水稻或小麦,照样能够继承水稻文化或小麦文化。“水稻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理论框架来解释,为什么按照富裕程度来说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都很富裕,应该发展出个人主义,但实际上东亚的个人主义却很少;同时,“水稻理论”在传统的东西方对比之外,试图解释中国南北方的文化差异,加深人们对东亚文化细微差别的认识,开辟了一条研究中国文化的新思路(Talhelm, Zhang, Oishi, Shimin, Duan, Lan, & Kitayama, 2014; 朱滢, 2014, 2015)。不过,正如朱滢所说, Talhelm 等人勇敢挑战已有的东亚与西方的对比研究,用水稻农

业与小麦农业的差别来解释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但水稻理论能否成立有待检验。这不仅不是他们测量的结果需要重复验证，而且他们所用的测量任务较单一，仅限于量表测量，缺乏更为严格的行为实验和神经科学的证据（朱滢，2014）。

第二，修改稿引用了马欣然等人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内容如下：

中国幅员辽阔，从北至南跨越了北温带到热带的诸多温度带，这些温度带上的地理生态、生活方式都有明显差异。同时，因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311年）和1127年的“建炎南渡”，包括士大夫和世族大家等社会精英在内的大批人口为避战乱曾两次从中原迁往长江中下游及长江以南地区，结果，自南宋至清末，中国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也叫“中原文化”）的重心所在，其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程度要高于北方地区，而北方地区则屡次被文化相异的少数民族政权所统治，中原文化对其的影响反而在中原人口南迁、汉胡民族融合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减弱（葛剑雄，2013，pp.104-129；马欣然，任孝鹏，徐江，2016）。

.....

尽管 Talhelm 与马欣然等人的研究都有一定的调查数据作依据，却不能由此轻易得出如下结论：种植小麦的中国北方在文化上更像西方：更倾向分析思维，有更高程度的个人主义；中国南方地区的集体主义倾向较北方地区更强烈（马欣然，任孝鹏，徐江，2016）。理由至少有三：（1）问卷或测量若想获得可靠结果，一个基本前提是其背后的理念要科学，如果理念有偏差，按它编制出的问卷或量表必有偏差，由此得出的结果与结论自然也易出现偏差。依费孝通的研究，中国人的行为特色并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而是自我主义（或叫自我中心主义）（1998，p.28）。杨中芳（2001，pp.107-145）也建议，为了避免由简单的跨文化比较而歪曲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方式，应放弃对“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这个表层特征的探讨。但 Talhelm 与马欣然等人的研究恰恰采纳了费孝通与杨中芳所批判的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理念来研究中国人。（2）马欣然等人的研究未考虑到存在“北方人到南方学习或工作，南方人到北方学习或工作”的事实，简单地将北方和南方地区选出的被试分别当作北方和南方被试；并且，他们采用的是方便取样，被试总数较少（只有745人），南北方被试数量不均衡（北方被试454人，南方被试291人）（马欣然，任孝鹏，徐江，2016）。（3）假若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体系重心的不断南迁，自南宋至清末，较之北方，南方受到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体系浸润更深，那么，自清末民初以来，南方先是得革命风气之先、后是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受儒学影响反又式微，与此相反，北方尤其是华北受帝都北京的影响甚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反而更加保守。与此相一致，当年主要生活在北京的满清皇室成员几乎都主张帝制，主张复辟帝制的袁世凯也是北方人，而新文化运动时，“打孔家店”的代表人物吴虞、陈独秀、胡适等都是南方人，“辛亥革命”和“八一南昌起义”都发生在南方，主张革命的孙中山与毛泽东都是南方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最早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都在南方，现在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的南方经济总体上较之北方要发达，中国大陆地区人口和人才流动才呈现明显的“孔雀东南飞”态势。正由于此，较之北方，当下南方尤其是东南沿海和沿江地区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发达，富裕起来的南方人往往既传统又现代，从而更讲诚信，待人更慷慨、更宽容，人我界限、公私界限更清晰。一项在江苏（代表发达地区）、新疆和广西（代表发展中地区）三地投放问卷1200份、收回有效问卷1149份的调查结果也表明，在关于当前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精神到底由哪些元素构成的多项选择中，“市场经济中形成的道德”占40.3%，“意识形态提倡的社会主义道德”占25.2%，“中国传统道德”占20.8%，“受西方道德影响”占11.7%。这说明当前中国伦理道德总体上处于市场经济中形成的道德占主导的状态；意识形态倡导的道德与传统道德在社会生活中虽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二者之总和才略高于市场经济形成的道德所产生的影响；西方道德对当代中国人的道德生活虽有一定影响，但影响并不像人们感觉或想象的那么大（樊浩，2009）。

因此，仅根据南方人对诚实的朋友更慷慨，对不诚实的朋友更宽容，对内外圈子即朋友和陌生人之间的边界也更为清晰（马欣然，任孝鹏，徐江，2016），似无法认定南方地区集体主义倾向较北方地区更强烈。

意见 2: 对前人研究的理解和评价方面。（1）作者似乎未把握好心理学研究结果的含义。在 Talhelm 等人（2014）的研究中，整体或分析思维是一个相对概念，中国南方相对于北方更倾向于整体思维，这不是在绝对水平上说的。中国北方更像西方也是一个相对的说法，是相对中国南方而言的，而不是说绝对的“像”或是“不像”。水稻理论的观点同样是从相对意义上来说的，而非仅仅从作者理解的绝对意义来说的。若从相对意义上来看，受批驳的很多观点实际上是无可厚非的。因此，作者需要重新考虑文中的批驳妥当与否，并进行相应的修改。

（2）作者认为“水稻理论”存在数据驱动的问题，但文中并没有给出存在这个问题的原因解释。建议作者简要介绍 Talhelm 等人的研究方法，分析之后再得出数据驱动的结论。

回应: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建议！评审专家所指出的问题已在正文中一一作了相应修改，具体地讲：

第一，此次修改稿先将 Talhelm 等人（2014）的见解表述为“尽管中国北方更像西方也是一个相对的说法，是相对中国南方而言的，而不是说绝对的‘像’或是‘不像’”。然后，对它进行了反驳，反驳的理由之一已在对“意见 1”的回应中列出，这里不赘述。反驳的理由之二是，对北方人离婚率高提出新的解释：“较之南方人，北方成年男子常有‘大老爷们心态’，在当下女子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经济更独立的背景下，它极易提高离婚概率，当然，‘大老爷们心态’不是个人主义，因为它有明显的性别歧视色彩，缺少平等观念（费孝通，1998，p.28）。”

第二，此次修改稿删除了原先认为“水稻理论”存在数据驱动问题的表述。

意见 3: 逻辑推论方面。（1）假设不完备问题。作者认为，促成中国人崇尚整体思维的真正外因是“先人从长期的治水经历尤其是从鲧治水失败而大禹治水成功的一反一正事例”。虽然有道理，但若仅把洪水和治水经历作为中国人崇尚整体思维的外因，就把复杂的问题过度简化了。国外有研究指出，中国人的整体思维特征应该是多种外因长期共同促成的，例如中国的社会生态由可利于农业生产的平原、丘陵与能通航的河流构成，中央集权容易施行；由于农耕方式要求人们相互协作，而灌溉系统又要求中央集中管理，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和睦显得重要（详见 Richard E. Nisbett 教授所著《思维的版图》第二章）。建议作者先综合考虑其他因素，然后再论证自己找到的内外因为何是最核心的因素。（2）因果论证不完备。作者认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的提出与被认可，为中国人如何运用整体思维提供了一整套完整的思维运作方式，是促成中国人崇尚整体思维的真正内因。”但“这些学说的提出和被认可”和“崇尚整体思维”到底哪个为因，哪个为果，实际上并不那么明确。例如，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中国人崇尚整体思维，所以提出并认可这些学说？另外，古代西方也有整体论的思想，为何唯独东方的学说得到充分发展，并促成了整体思维呢？作者需要进行更完备、严密的论证。

回应: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建议！评审专家所指出的问题已在正文中一一作了相应修改，具体地说：

第一，增添了 Nisbett 等人解释影响整体思维产生的因素的观点（详见上文的回应部分）。

第二，剖析了没有这种可能性：“是因为中国人崇尚整体思维，所以提出并认可这些学说”：

从常理心上讲，人只要进行思考就须依靠一定的思维模式（刘承华，2002，p.69）。一个人或极少数中国人具有或偏爱整体思维，它不可能成为中国人的思维偏好，一定要多数中

国人都具有或偏向整体思维，它才能成为中国人的思维偏好。而要让多数中国人都具有或偏向整体思维，不可能是天生的或通过种水稻就能于无意中形成的（毕竟黄河流域的中国先民不种水稻），只能是先经文化精英将之提炼成一种或几种蕴含此思维模式的学说，然后再通过榜样示范、文化熏陶与教化而成。事实上，“整体”是一个近代名词，在中国古代一般称作“一体”或“统体”（张岱年，成中英等，1991，p.8），今人所说的整体思维在中国古代更多地是被叫作阴阳观/思维、五行说/思维与阴阳五行说/思维，所以，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的成熟过程，也正是整体思维逐渐成熟和应用范围不断拓宽、应用频次不断增加的过程。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基本上没有这种可能：因中国人先普遍崇尚整体思维，然后才提出并认可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

第三，剖析了西方虽有整体论却未发展出整体思维的原因。

在西方，整体论作为一种哲学思想至少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有人明确提出整体论（holism）这一范畴，以此彰显“在自然界中，通过创造性进化而产生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趋势”（段伟文，2007）。可见，古希腊时虽有朴素的整体论思想，却未及时发展出类似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学说。同时，由中国古典哲学家提出的整体论让人看到的是由单一物质组成的无缝隙的整体或是由几种物质水乳交融而构成的整体，这样，对中国人而言，世界是复杂的，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的，复杂性与相互依存性意味着要了解一个事物而不顾其背景是注定要失败的，并且，中国古典哲学的目标是追寻道与和谐而不是发现真理与追求自由，思想不能用来指导行动，这种思想就是无益的，结果，中国古人喜欢从天道中寻找人道，从人道中发现天道，这进一步促进了整体思维的发展。与中国古人不同，由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的整体论让人看到的是由互不关联的物体所形成的集合，而其中的物体又是由微粒组成的，由此生出世界到底是由原子还是由连续不断的物质构成的争论，这种争论在古代中国从未出现过；古希腊人又热衷于追求真理，向往自由、不愿受约束，认为世界在本质上不复杂，人们应该做的就是了解物体的特质，以便归类并寻找规律（Nisbett, 2003, pp.18-19; 尼斯贝特，2010, pp.16-17）。这是导致古希腊最终未能形成整体思维而走向分析思维的重要原因之一。

意见 4：引文论证方面。（1）文中运用了大量的历史学、古典文学文献记载，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不仅许多内容的可靠性值得商榷，如《史记》记载；而且表述过于细致，显得繁琐、累赘。比如在 1.1 部分，只要说明，虽然考古学研究表明，古代长江流域主要种植水稻，黄河流域主要种植小麦，但中华文明的核心圈在南宋以前分布在小麦种植区，南宋以后才转移到水稻种植区。同样的问题还存在 1.2、2.1、2.2 部分，对诸子百家、大禹治水、阴阳五行的介绍都太过繁琐，这些不应该是论证的核心，需要大大删节。（2）在整体思维形成的影响因素方面，作者提出的内因、外因都是基于自己的主观推断，没有有效的证据支撑。例如，作者认为“促成中国人崇尚整体思维的真正外因是从治水经验中获得了灵感与启发”，但作者只是挑选了一些支持自己观点的古代记载来论证。由于作者也只是提出自己的猜想或推断，没有充足的证据，建议作者在论述的语气上不要那么绝对和肯定。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指出的问题！对文中相应段落的文字进行了压缩与提炼，并调整了论文相应段落中的语气（如多处加了“最可能”一词以示推测之义），又补充了“粟”的有关证据，大致勾画出自先秦至北宋中国北方以粟而非小麦作为主要粮食的证据链。谢谢！

意见 5：其他：部分用语过于随意，需要修改。例如 1.1 末尾：“读者只要稍稍读过《管子》、《老子》、《文子》、《周易》、《庄子》、《孙子兵法》、《黄帝内经》与《吕氏春秋》等先秦名著，都会为古人精妙运用整体思维去分析问题、论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宽广视野与能力所折服！”又如 2.1 中：“事实上，读者只要仔细阅读并细心体会《史记·夏本纪第二》

中记载大禹治水的记载（司马迁，2005，pp.37-57），就能真切认识到大禹治水之所以取得成功，秘诀就在于他在长期的治水实践中直观、真切地看到了天人密切相关理念、顺应自然和通盘考虑（整体思维的雏形）在成功解决复杂问题时的重要性……”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细心指出的问题。在修改稿中，对相关语句作了调整和修订，使之表述更加严谨、准确。谢谢！

第二轮

审稿人 2 意见：

修改稿较好地回复了上轮审稿专家的意见，并对原稿有所改进。但还存在以下一些问题，需要作者考虑。

意见 1：Talhelm 等人（2014）提出“水稻理论”是为了解释中国（或东亚国家）内部的亚文化差异，而不是为了解释东西方文化之间差异。他们自己没有用“水稻理论”来解释中国人为何偏好整体思维。既然如此，摘要的首句话“用‘水稻理论’解释中国人偏好整体思维的缘由”中的主体又是谁呢？建议换种说法，或者在正文中明确要批判的主体。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建议！摘要的首句现已改成“Talhelm 等人认为种植水稻与种植小麦有重大差别，所以，中国水稻文化与小麦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南方的水稻文化更倾向于东亚文化，北方的小麦文化看起来更像西方文化。“水稻理论”视角颇新颖，但能否成立有待检验。以整体思维为例，用“水稻理论”解释中国人偏好整体思维的缘由时存在两个矛盾：……”谢谢！

意见 2：目前文章正文（不含摘要、参考文献）字数偏多，建议进一步删减。例如对于阴阳学说、五行学说方面的交代还可以大大简化。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建议！此轮修改中又对论文作了进一步的删减，谢谢！下面以两例作说明：

（1）原先正文部分写作：

依据“水稻理论”，“生活在水稻种植区的中国人具有东亚文化的一些特点：更倾向整体思维，更程度的互依型自我构念，以及更低的离婚率；种植小麦的中国北方在文化上更像西方：更倾向分析思维，有更高程度的个人主义与更高的离婚率。”（Talhelm, et al., 2014）。但事实上，只要稍微对生活在中国北方人和生活在水稻区的中国南方人有所了解，都知道这个结论无法成立。换言之，虽然中国幅员辽阔，从北至南跨越了北温带到热带的诸多温度带，这些温度带上的地理生态、生活方式都有明显差异。同时，因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311 年）和 1127 年的“建炎南渡”，包括士大夫和世族大家等社会精英在内的大批人口为避战乱曾两次从中原迁往长江中下游及长江以南地区，结果，自南宋至清末，中国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也叫“中原文化”）的重心所在，其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程度要高于北方地区，而北方地区则屡次被文化相异的少数民族政权所统治，中原文化对其的影响反而在中原人口南迁、汉胡民族融合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减弱（葛剑雄，2013，pp.104-129；马欣然，任孝鹏，徐江，2016）。这导致生活在中国北方人和生活在水稻区的中国南方人在家庭供暖方式、身高、饮食习惯、方言与性格等方面都有一定差异。例如，北方人身高普遍高于南方人；较之南方人，北方成年男子常有“大老爷们心态”，在当下女子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经济更独立的背景下，它极易提高离婚概率，当然，“大老爷们心态”不是个人主义，因为它有明显的性别歧视色彩，缺少平等观念（费孝通，1998，p.28）。

不过，尽管 Talhelm 与马欣然等人的研究都有一定的调查数据作依据，却不能由此轻易得出如下结论：种植小麦的中国北方在文化上更像西方：更倾向分析思维，有更高程度的个人主义；中国南方地区的集体主义倾向较北方地区更强烈（马欣然，任孝鹏，徐江，2016）。理由至少有三：（1）问卷或测量若想获得可靠结果，……

此部分现修改并压缩成如下内容：中国幅员辽阔，从北至南跨越了北温带到热带的诸多温度带，这些温度带上的地理生态、生活方式都有明显差异。同时，因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311年）和1127年的“建炎南渡”，包括士大夫和世族大家等社会精英在内的大批人口为避战乱曾两次从中原迁往长江中下游及长江以南地区，结果，自南宋至清末，中国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也叫“中原文化”）的重心所在，其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程度要高于北方地区，而北方地区则屡次被文化相异的少数民族政权所统治，中原文化对其的影响反而在中原人口南迁、汉胡民族融合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减弱（葛剑雄，2013，pp.104-129；马欣然，任孝鹏，徐江，2016）。这导致中国北方人和南方人在家庭供暖方式、身高、饮食习惯、方言与性格等方面都有一定差异。例如，北方人身高普遍高于南方人；北方人多以面食为主食，南方人多以米饭为主食；等等。

不过，尽管 Talhelm 与马欣然等人的研究都有一定的调查数据作依据，却不能由此轻易得出如下结论：与种植小麦的中国北方人相比，生活在水稻种植区的中国南方人具有东亚文化的一些特点：集体主义倾向较北方地区更强烈；更倾向整体思维，更高程度的互依型自我观念，以及更低的离婚率；与种植水稻的中国南方人相比，种植小麦的中国北方在文化上更像西方：有更高程度的个人主义；更倾向分析思维；有更高的离婚率。”（Talhelm, et al., 2014；马欣然，任孝鹏，徐江，2016）。理由至少有四：（1）问卷或测量若想获得可靠结果，……

（2）原先正文部分如下：

蕴含在阴阳五行学说中的阴阳五行思维模式不但吻合中国古人所推崇的“天人合一”境界，而且具有五个鲜明特点：①坚持气一元论。无论是阴阳转化还是五行相生相克，乃至动静转化或虚实转化，都需要有一个载体，并且，这个载体须能打通宇宙万物，包括打通西方人常说的物质与精神两个范畴，在此背景下，气一元论（也叫元气论）应运而生。在中国先哲看来，元气是整体的、有机的、连续的、无边界的、不可分割的；元气充斥并流行于宇宙万物之间，既不断运动，又在运动中化生万物。②它无须外部动力推动。它自身就是一个动态模式，自身就有动力机制，即它以阴阳的相互转化和五行间相生相克提供动力之源，以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提供运动的方向与轨迹。③它不可分解。它是一个整体与一个动态平衡系统，任何一种分解都是对这个模式的破坏，都意味着这一系统已不复存在。④系统内各要素间的联系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是相互作用，而不是单线因果关系；是网状结构，而不是树状或金字塔结构。⑤它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自我反馈功能的自平衡系统。无论相生还是相克，它都是一个循环不已的动态圆。这表明阴阳五行思维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同时兼顾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和循环思维的既开放又封闭的思维方式：说它开放，是因为它面向宇宙万物敞开胸怀，……

此部分现修改并压缩成如下内容：蕴含在阴阳五行学说中的阴阳五行思维模式不但吻合中国古人所推崇的“天人合一”境界，而且是一种同时兼顾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和循环思维的既开放又封闭的思维方式：说它开放，是因为它面向宇宙万物敞开胸怀，……

意见 3：作者对前人研究的引述还存在问题。如作者说“马欣然等人的研究未考虑到存在‘北方人到南方学习或工作，南方人到北方学习或工作’的事实，简单地将北方和南方地区选出的被试分别当作北方和南方被试。”但实际上该研究是在某一高校进行调查，是根据生源来划分南北方人的。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细致阅读！现已将“马欣然等人的研究未考虑到存在‘北方人到南方学习或工作，南方人到北方学习或工作’的事实，简单地将北方和南方地区选出的被试分别当作北方和南方被试。”从文中删除了，谢谢！

第三轮

编委意见：

诚如两位外审专家所说，本文在选题、论述等方面都具有创新性，并且勇于挑战权威期刊的成果，是值得尊重的。经过两轮修改之后文章质量得到了较大提升。目前还有一些问题尚需与作者进行商榷：

意见 1：标题尚可完善。尽管在港台学界的确存在类似的标题，但目前的标题无法涵盖全文，建议增加副标题予以补充。

回应：非常感谢编委提出的宝贵意见！现将题目改成《对水稻理论的质疑：兼新论中国人偏好整体思维的内外因》，谢谢！

意见 2：关于综述部分，作者修改后增加了朱滢（2014、2015）两篇评述性文章。目前仍显薄弱，Talhelm 等人的文章发表在 *Science* 上，关注度极高，那么国际学界对该理论有何评价？有没有质疑？建议作者予以补充和完善。目前这项已经被一些文化心理学教科书所引用，影响颇大。

回应：非常感谢编委提出的宝贵意见！这次在文献综述部分增添了 3 篇相关的英文评论性论文：

(1) Hu, S., & Yuan, Z. (2015). Commentary: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s. wheat agricultur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6. doi: 10.3389/fpsyg.2015.00489.

(2) Roberts, S. G. (2015). Commentary: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s. wheat agricultur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6. doi: 10.3389/fpsyg.2015.00950.

(3) Ruan, J., Xie, Z., & Zhang, X. (2015). Does rice farming shape individualism and innovation? : A response to Talhelm et al. *Food Policy*, 56, 51-58.

随后，在引言部分添加了第三篇论文的核心思想，修改后的内容如下；第一篇论文的核心观点放在正文中，详情请见对“意见 5”的回应部分；第二篇论文的核心观点放在正文中，详情请见对“意见 3”的回应部分：

Hu 和 Yuan（2015）认为 Talhelm 等人（2014）的研究中忽视了一些与研究结论有关的关键数据，即将以大豆和玉米为主要农作物的地区也归类为小麦产区。但在中国北方，玉米和小麦是同等重要的粮食作物，甚至在有的省份玉米比小麦更为重要。并且，同小麦一样，玉米在各省的种植面积也同水稻呈负相关。也就是说，在对中国人心理的影响程度方面，种植玉米和种植小麦是同等重要的。此外，种植小麦所需要的生产力远远低于水稻，种植玉米所需要的生产力介于种小麦和种水稻之间但更偏向于水稻。这也说明小麦和玉米应该分别与水稻进行对比。所以，Hu 和 Yuan (2015) 认为，宜将“水稻 vs 小麦”理论改为“水稻 vs 非水稻”理论。相应地，原先的推论也需要修改。因为从“水稻 vs. 非水稻”理论将会推导出：种植水稻的东亚或东南亚与不种水稻的世界其它地方人的心理不同。这一推论与当今认为西方与非西方二分的心理差异的主流观点不符。一些非西

方国家，如阿拉伯人、东亚人、俄罗斯人，以及非洲与南美洲的农民，相对于西方人来说都是整体思维，多持互依我（Henrich, Heine, Norenzayan, 2010）。同时，据“水稻 vs. 非水稻”理论，一些种植小麦或玉米地区的人理应更像西方人，但他们却表现出整体思维。所以，无论“水稻 vs. 小麦”还是“水稻 vs. 非水稻”，可能都只是表面现象，水稻、小麦、玉米与大豆在不同地区的生产成本（production cost）不同，而生产成本可能才是背后的决定性因素，今后的研究宜重点考察不同农业的生产成本，而不是农业本身。Roberts（2015）与 Ruan 等人（2015）也撰文指出水稻理论本身的不足，下文有引用，这里不赘述。本文以整体思维为切入口，从中国文化心理学角度，结合考古学、历史学、古典哲学和文学文献等方面的证据，……

意见 3: 作者认为水稻理论矛盾之一是“1.1 南宋之前的多数中国人虽长期生活在小麦区，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却主要是整体思维”，1.1 部分第三段称：“可事实却是：南宋之前的多数中国人虽长期生活在小麦区，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却是整体思维而非分析思维，……”，需要作者注意，Talhelm 等人（2014）的文章并没有将生活在小麦区者的思维方式认定为分析思维，中国人无论生活在小麦区还是水稻区，都是整体性思维方式，只是整体性思维所占的比重不同，水稻区者整体性思维的比例高于小麦区者。

回应: 非常感谢编委提出的宝贵意见！本文是想通过指出上述矛盾来告诉人们：对于中国古人而言，无论是生活在小麦区还是水稻区，整体思维与分析思维都是“有”和“无”的问题，即中国南北方要有整体思维就都有整体思维，若无整体思维就都无整体思维，而不是“多”和“少”的问题，即不可能存在“生活在水稻区的中国南方人的整体性思维的比例要高于生活在小麦区的中国北方人”的现象。正由于生活在小麦区和水稻区的中国古人都偏重整体思维而少分析思维，才导致中国古典思维方式的一大弊病是“缺少分析思维”（张岱年，成中英等，1991，pp.13-14；汪凤炎，郑红，2015，pp.627-628）。近现代中国人不是从种植小麦而是从西方学会使用分析思维的。Roberts（2015）也认为，Talhelm 等人将各省作为独立样本测量其文化特质，没有控制不同省份之间的历史关系。实际上，农耕方式和文化价值观既可能是从传统文化中继承的，也可能从现当代文化中引进的。从传统文化中继承的文化特质和从外来文化中获得的的文化特质之间会存在虚假相关，即高尔顿问题（Galton's problem）。这就意味着 Talhelm 等人研究中的数据可能由非独立的点组成，夸大了水稻种植和集体主义之间的相关性。

意见 4: Talhelm 等人（2014）文中提到 Medieval Chinese，大致是说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后人们就开始注意到小麦与水稻种植的劳动差异。至于考古学上发现各种作物最早何处出现何时出现，很难代表它们成为各自地区人们赖以生存的生存方式。Talhelm 等人（2014）文中写到：“Farm rice and wheat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pass on rice or wheat cultures”，可以理解为不管各种作物的最早种植和变迁如何，只要人们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以水稻或小麦种植为生存方式就可以影响人们思维方式。

回应: 非常感谢编委提出的宝贵意见！本文通过论证已表明，即便中国南方人生活在水稻区和北方人生活在小麦区已有 over thousands of years，仍无法证明以水稻或小麦种植为生存方式就可以影响中国人是否更加偏重整体思维方式。

意见 5: 作者认为水稻理论的矛盾之二是“1.2 目前无可靠证据证明种植小麦的中国北方在文化上更像西方”。1.2 正文写到“却不能由此轻易得出如下结论：生活在水稻种植区的中国南方人具有东亚文化的一些特点：集体主义倾向较北方地区更强烈；更倾向整体思维，更程

度的互依型自我构念，以及更低的离婚率；种植小麦的中国北方在文化上更像西方：有更高程度的个人主义；更倾向分析思维；有更高的离婚率。””，“综上所述，目前没有可靠证据证明自小生活在小麦区的中国北方在文化上更像西方，也无足够证据证明中国北方人就更倾向个人主义，更擅长分析思维，而生活在水稻区的中国南方人就更倾向集体主义，更擅长整体思维。”需要注意的是 Talhelm 等人（2014）此处是将水稻区省份和小麦区省份相比较而言，即水稻区被试比小麦区被试 more holistic-thinking, interdependent, and loyal/nepotistic。这一点第二位审稿专家已经指出：“……而不是说绝对的像或是不像……”。关于这一点请参考 Talhelm 等人（2014）Fig.2 中的数据显示，北方人整体思维约占 55-60%（根据目测），图中未显示（也不会显示）西方人整体思维的比例，但肯定会更低，应该在 50% 以下。因此，说小麦区者比水稻区者更像西方人从逻辑上是成立的。只不过，北方人仍是整体思维为主，而西方人是分析思维为主的。

回应：非常感谢编委提出的宝贵意见！对于此问题答复如下：

尽管 Talhelm 与马欣然等人的研究都有一定的调查数据作依据，却不能由此轻易得出如下结论：与种植小麦的中国北方人相比，生活在水稻种植区的中国南方人具有东亚文化的一些特点：集体主义倾向较北方地区更强烈；更倾向整体思维，更高程度的互依型自我构念，以及更低的离婚率；与种植水稻的中国南方人相比，种植小麦的中国北方在文化上更像西方：有更高程度的个人主义；更倾向分析思维；有更高的离婚率。”（Talhelm, et al., 2014；马欣然，任孝鹏，徐江，2016）。理由至少有四：（1）问卷或测量若想获得可靠结果，一个基本前提是其背后的理念要科学，如果理念有偏差，按它编制出的问卷或量表必有偏差，由此得出的结果与结论自然也易出现偏差。依费孝通的研究，中国人的行为特色并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而是自我主义（1998, p.28）。杨中芳（2001, pp.107-145）也建议，为了避免由简单的跨文化比较而歪曲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方式，应放弃对“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这个表层特征的探讨。但 Talhelm 与马欣然等人的研究恰恰采纳了费孝通与杨中芳所批判的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理念来研究中国人。（2）Ruan 等人（2015）在详细分析 Talhelm 等人（2014）的实证方法后，发现原文存在着样本偏差、测量误差、模型设定错误等问题，由此认为 Talhelm 等人的研究高估了水稻种植在塑造文化心理和创新性方面的作用。马欣然等人的研究采用的是方便取样，被试总数较少（只有 745 人），南北方被试数量不均衡（北方被试 454 人，南方被试 291 人）（马欣然，任孝鹏，徐江，2016）。（3）假若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体系重心的不断南迁，自南宋至清末，较之北方，南方受到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体系浸润更深，那么，自清末民初以来，南方先是得革命风气之先、后是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受儒学影响反又式微，与此相反，北方尤其是华北受帝都北京的影响甚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反而更加保守。与此相一致，当年主要生活在北京的满清皇室成员几乎都主张帝制，主张复辟帝制的袁世凯也是北方人，而新文化运动时，“打孔家店”的代表人物吴虞、陈独秀、胡适等都是南方人，“辛亥革命”和“八一南昌起义”都发生在南方，主张革命的孙中山与毛泽东都是南方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最早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都在南方，现在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的南方经济总体上较之北方要发达，中国大陆地区人口和人才流动才呈现明显的“孔雀东南飞”态势。正由于此，较之北方，当下南方尤其是东南沿海和沿江地区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发达，富裕起来的南方人往往既传统又现代，从而更讲诚信，待人更慷慨、更宽容，人我界限、公私界限更清晰。一项在江苏（代表发达地区）、新疆和广西（代表发展中地区）三地投放问卷 12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1149 份的调查结果也表明，在关于当前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精神到底由哪些元素构成的多项选择中，“市场经济中形成的道德”占 40.3%，“意识形态提倡的社会主义道德”占 25.2 %，“中国传统道德”占 20.8%，“受西方道德影响”占 11.7%。这说明当前中国伦理道德总体上处于市场经济中形成的道德占主导的状态；意识形态倡导的道德与传统道德在社会生活中虽发挥了很大作

用，但二者之总和才略高于市场经济形成的道德所产生的影响；西方道德对当代中国人的道德生活虽有一定影响，但影响并不像人们感觉或想象的那么大（樊浩，2009）。因此，仅根据南方人对诚实的朋友更慷慨，对不诚实的朋友更宽容，对内外圈子即朋友和陌生人之间的边界也更为清晰（马欣然，任孝鹏，徐江，2016），似无法认定南方地区集体主义倾向较北方地区更强烈。（4）较之南方人，北方成年男子（尤其是东北三省的成年男子）常有“大老爷们心态”，在当下女子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经济更独立的背景下，它极易提高离婚概率。Talhelm 等人（2014）文中的图 2 数据也显示，黑龙江、辽宁、吉林三省的离婚率相对最高，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不过，“大老爷们心态”不是个人主义，因为它有明显的性别歧视色彩，缺少平等观念（费孝通，1998，p.28）。同时，Ruan 等人（2015）在文中提供了一组与 Talhelm 等人完全相反的离婚率数据：Ruan 等人以专利数（一个衡量创新的指标）为参照，发现自 1995 年至 2011 年，水稻省份专利数的增长高于小麦区，与此相吻合，水稻省份的离婚率也几乎年年高于小麦省份的离婚率。所以，无论中国北方是否有比南方更高的离婚率，都不能将之作为推测中国北方相对于南方而言在文化上更像西方的证据之一。

综上所述，因中国北方人与西欧人生活在差不多相同的纬度上，故二者在身高上很类似，即都普遍长得高大；且都以面食为主食。除这两点相似外，目前没有足够证据显示中国北方人和西方人有更多心理与行为上的相似点。即便中国北方人和西方人都爱吃面食，但在做法/吃法上仍有较大差异：中国北方人的面食主要以面条、饺子、馒头、包子、饼、窝窝头等为主，但几乎不烤面包；西方人的面食以面包为主，却几乎不做成中国北方的面食。目前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自小生活在小麦区的中国北方在文化上更像西方，也无足够证据证明中国北方人就更倾向个人主义，更擅长分析思维，而生活在水稻区的中国南方人就更倾向集体主义，更擅长整体思维。退一步讲，即便 Talhelm 等人（2014）持下列说法，仍说不通：中国人无论生活在小麦区还是水稻区，都是整体性思维方式，只是整体性思维所占的比重不同：生活在水稻区的中国南方人的整体性思维的比例高于生活在小麦区的中国北方人。因为对于中国古人而言，无论是生活在小麦区还是水稻区，整体思维与分析思维都是“有”和“无”的问题，即中国南北方要有整体思维就都有整体思维，要无整体思维就都无整体思维，而不是“多”和“少”的问题，即不可能存在“生活在水稻区的中国南方人的整体性思维的比例要高于生活在小麦区的中国北方人”的现象。理由是：对秦汉之后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思维方式产生深刻影响的先秦“诸子百家”的创始人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几乎都来自小麦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今山东曲阜人；孟子是今山东邹城人；荀子是赵国人。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是今河南周口市人，庄子是今河南商丘人。兵家创始人孙子是齐国人。法家的先驱管子是今安徽颍上县人，子产是郑国人；法家学派的开山者李悝是战国初魏国人、商鞅是卫国人、申不害是今河南人、慎到是战国时赵国人；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子是韩国贵族。墨家的创始人墨子相传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名家的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前者是宋国人，后者是赵国人。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驺衍（即邹衍）是齐国人。纵横家的创始人鬼谷子的籍贯不详，相传是战国时楚人；纵横家的代表人物是苏秦和张仪，前者是战国时东周洛阳人，后者是战国时魏国人。杂家代表人物吕不韦是今河南省濮阳人。医家代表人物扁鹊是战国时期勃海郡鄆（今河北任丘）人。但是，这些产自小麦区的中国大哲并未显示出继承小麦文化后擅长分析思维的特点（Talhelm, et al., 2014），反而更擅长整体思维，也就是说，生活在小麦区的中国北方人在思维方式上以整体思维占绝对优势，且无论在所占比例和使用水平上，均丝毫不低于也不逊色于中国南方人。正由于生活在小麦区和水稻区的中国古人都偏重整体思维而少分析思维，才导致中国古典思维方式的一大弊病是“缺少分析思维”（张岱年，成中英等，1991，pp.13-14；汪凤炎，郑红，2015，pp.627-628）。近现代中国人不是从种植小麦而是从西方学会使用分析思维的。Roberts（2015）也认为，Talhelm 等人将各省作为独立样本测量其文化特质，没有控制不同省份之间的历史关系。实际上，农耕方式和文化价值观既可能是从传统文化中

继承的，也可能从现当代文化中引进的。从传统文化中继承的文化特质和从外来文化中获得的文化特质之间会存在虚假相关，即高尔顿问题（Galton's problem）。这就意味着 Talhelm 等人研究中的数据可能由非独立的点组成，夸大了水稻种植和集体主义之间的相关性。

意见 6: 本文论及大禹治水经验促成中国人整体思维。文中大量篇幅在讨论大禹治水事件本身，而大禹治水的经验如何深刻影响了中国人思维方式仍显得缺乏有效的论据支撑。例如：“我闻在昔鯀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仅仅是描述事实而已。再如，后文称：“即便到了商末、西周初年，箕子仍是从鲧治水失败而禹治水成功的事例说起，用它们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这表明鲧治水失败与禹治水成功这两件事对时人的影响之巨！”也难以构成大禹治水经验影响中国人整体思维的有效证据或逻辑链条。

回应: 非常感谢编委提出的宝贵意见！从外因上看，中国人偏向整体思维是多种外因长期共同交互作用的结果。例如，中国的社会生态主要由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较肥沃平原、丘陵与能通航的河流构成，所以，中央集权统治较易施行；农耕方式要求人们相互协作，而灌溉系统又要求中央集中管理，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和睦便显得重要；中国人在经济、社会行为和政治生活中必须照顾到周围的同辈和上司，这种社会实践有利于中国人养成整体思维的习惯；中国的世俗哲学强调自我与他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Nisbett, 2003, pp.32-39；尼斯贝特，2010，pp.29-33）；汉语是整体定位法，文无标点，也不分段，意义在网络中被决定，整体决定部分，对整体了解越多，对个体也就了解越多；重视关系（包括人际关系）超过重视实体、强调整体尤其是关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偏向综合而疏于分析的文化基因（张岱年，成中英等，1991，p.197，pp.212-213）。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培养中国人的整体思维。在这诸种外因中，若一定要寻找一个最可能的重要外因，它会是什么呢？因商之前缺少文字记载，且时代久远，上古人写作时又无在论著上署真实姓名的习惯，致使中国人偏好整体思维的最可能的重要外因可能永远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了。不过，若用排除法，上述诸因素都不可能是致使中国人偏好整体思维的最可能的最重要外因，本文通过大量证据也证明不可能是种植水稻。随后，本文作者通过细读《史记·夏本纪第二》，发现治水成功与否关系到个人与族群的兴衰存亡，推测它可能是致使中国人偏好整体思维的最可能的最重要外因。它虽非直接证据，但也算持之成理，言之有据了。

意见 7: 后文提出促成中国人崇尚整体思维的真正内因是阴阳学说、五行学说、阴阳五行学说提出和认可，其大部分内容是在讨论阴阳五行学说本身及其背后的思维。如果说阴阳学说/思维、五行学说/思维、阴阳五行学说/思维在一定意义来说本身就是一种整体思维（例如，作者写道：“今人所说的整体思维在中国古代更多地是被叫作阴阳观/思维、五行说/思维与阴阳五行说/思维”），用一种整体思维去论证它影响了中国人的整体思维，是否妥当？进一步来说的话，那么又是什么导致了中国人提出阴阳/五行/阴阳五行学说（思维）这种整体性思维呢？在这个问题上，仍需要作者予以解释和说明。

回应: 非常感谢编委提出的宝贵意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整体”是一个近代名词，在中国古代一般称作“一体”或“统体”（张岱年，成中英等，1991，p.8），今人所说的整体思维在中国古代更多地是被叫作阴阳观/思维、五行说/思维与阴阳五行说/思维，所以，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的成熟过程，也正是整体思维逐渐成熟和应用范围不断拓宽、应用频次不断增加的过程。正由于此，需要花一定篇幅去梳理和论证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的成熟过程，这样做可以让读者较完整而清晰地体会到整体思维在中国的成熟过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用一种整体思维去论证它影响了中国人的整体思维”。同时，这样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澄清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是三种学说，并非像有些人误

解的那样是一种学说，即认为只有阴阳五行学说一种学说。至于“是什么导致了中国人提出阴阳/五行/阴阳五行学说（思维）这种整体性思维呢？”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这三种学说的演进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花费了无数人的心血（梁启超，1921；徐复观，1961a, 1961b, 1961c；刘起鈇，1980；李学勤，1986），但因商之前缺少文字记载，且时代久远，上古人写作时又无在论著上署真实姓名的习惯，致使“是什么导致中国人提出阴阳/五行/学说（思维）”这个问题可能同样永远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了。至于中国人为什么要提出阴阳五行学说（思维），综合梁启超（1921）；徐复观（1961a, 1961b, 1961c）等人的见解，是阴阳家邹衍最早将五行从杂多的社会迷信中提出来以建立“五德转移”新说，并引起世人的注意。邹衍创立终始五德说的动机和目的，是将原始宗教作变相复活，用一种新说来解释王朝的更替。因为五行的德以次运转，乃天命的具体化，天命是来自神的意志。对于当时的人君而言，这等于是政治中的神意。故涂上天道循环论色彩的五德终始说将天与人沟通起来，把王朝、帝王的更替看作是天意，这让当时的人君既感到新奇，又感到轻松和新的希望。这是政治中的新宗教，后来的统治者秦始皇果然首先采用此说，并沿此以建立统治者所希望的新宗教。随后，经吕不韦及其门客、秦始皇、董仲舒、刘向和班固等人的鼓吹密切与不断充实，阴阳五行学说终于越来越丰满、完善，并最终在中国古代一统江湖。至于秦汉以降的中国古人喜爱阴阳五行说的内因，则是因它融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二者之长于一体，较之单一的阴阳学说或五行学说拥有更加严密的内在逻辑性和系统性：一方面，阴阳学说能方便地表征两两成对的事物，也可解释事物间的相互转化关系；稍有欠缺的是，阴阳学说无法圆润地解释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以及不同事物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也无法与五脏五情等一一匹配。五行学说能圆润地解释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以及不同事物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也能很好地将五脏五情等与五行一一匹配，但在表征两两成对的事物相互转换方面，显然不如阴阳学说圆润。另一方面，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有两个共通之处：二者都以元气论为基础和载体，并且，无论是阴阳还是五行，都不是具体物，而是二种或五种气或元素，它们都可表征万物；二者都蕴含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故阴阳可相互转换，五行之间同样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这表明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既互补又能融通。（Boorstin, 1997, p.23）这样，将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合为一体形成的阴阳五行学说，其背后的阴阳五行思维模式不但吻合中国古人所推崇的“天人合一”境界，而且具有五个鲜明特点：①坚持气一元论。无论是阴阳转化还是五行相生相克，乃至动静转化（其内蕴含动静思维或动静论，故会讲动静转化）或虚实转化（其内蕴含虚实思维或虚实论，故也会讲虚实转化），都需要有一个载体，并且，这个载体须能打通宇宙万物，包括打通西方人常说的物质与精神两个范畴，在此背景下，气一元论（也叫元气论）应运而生。在中国先哲看来，元气是整体的、有机的、连续的、无边界的、不可分割的；元气充斥并流行于宇宙万物之间，既不断运动，又在运动中化生万物。②它无须外部动力推动。它自身就是一个动态模式，自身就有动力机制，即它以阴阳的相互转化和五行间相生相克提供动力之源，以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提供运动的方向与轨迹。③它不可分解。它是一个整体与一个动态平衡系统，任何一种分解都是对这个模式的破坏，都意味着这一系统已不复存在。④系统内各要素间的联系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是相互作用，而不是单线因果关系；是网状结构，而不是树状或金字塔结构。⑤它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自我反馈功能的自平衡系统。无论相生还是相克，它都是一个循环不已的动态圆。这表明阴阳五行思维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同时兼顾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和循环思维的既开放又封闭的思维方式：说它开放，是因为它面向宇宙万物敞开胸怀，容纳宇宙万物；说它封闭，是因为它自成一个封闭体系，循环不已。这样，阴阳五行思维模式便能圆润地解释宇宙万物的生、长、病、死，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在中国人心中，它成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解释原则和宇宙人生的公式（刘承华，2002, pp.70-71），并通过教化、模仿等方式为广大精英（包括政治精英与学界精英等）与普通民众所认可与推崇，结果，阴阳五行说

成为中国人尤其是自汉代以降至清代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古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二千余年来，它有极强固的势力（顾颉刚，1982，p.404）。这导致中国人习惯用整体的、动态的、自调自适的阴阳五行模式来解释、研究各种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刘承华，2002，p.71），至此，中国人运用整体思维来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习惯已牢不可破，中国古代汉族的天文学、气象学、哲学、政治学、史学、化学、算学、音乐和中医等等，都是在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和阴阳五行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夏征农，陈至立，2010，p.2267）。